



马世长 著

中国佛教 石窟考古文集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佛教
石窟寺考古文集

中国佛教 石窟寺考古文集

中国佛教
石窟寺考古文集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

马世长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 / 马世长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0630-6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石窟—佛教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9.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136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

马世长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0630-6

2014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2 3/4

定价: 180.00元



欧亚 备要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音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勤朴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 欣
王希隆	魏存成	徐文堪	许序雅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主编：余太山 李锦绣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编辑说明

收入文集的二十六篇文章，主要是有关龟兹石窟和敦煌石窟的。这是因为多年来我比较关注西北地区石窟的调查和研究。

文章发表于不同时期，因受到资料和自己认识的局限，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实是在所难免。论文收入文集时未作改动，意在保存原来面貌。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故匪敢以今日之是，以掩饰昔日之非。抑或有文字和插图相互重复之处，亦未加删除。

此外，《北京大学与中国佛教考古》一文，是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际汉学研究会议上的发言稿（与李崇峰博士合写）。概述北京大学与中国佛教考古学发展的渊源关系，以及这一学科教学和科研的状况。今借作代前言置于卷首。

以下文稿依据地域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关于新疆石窟的五篇，以龟兹石窟为中心。

《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两文，综合介绍克孜尔石窟的基本情况，较为细致地记录了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遗存，并对若干本生和因缘故事画做了解读。龟兹石窟中出现汉地风格的壁画，是中原文化西渐龟兹的具体反映。《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和《新疆石窟中的汉风洞窟和壁画》两文，对库木吐喇石窟以及新疆主要石窟的汉风洞窟的内涵与特征做了说明和阐释。三仙洞是新疆石窟中位置最西的一处，极难登临。《三仙洞年代别议》一文，据笔者实地踏查的记录，对该石窟遗存内容与年代做了新的诠释和推论。

第二、第三两组文稿是记录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的论文，共十四篇，是文集的主体内容。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和《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两文，讨论藏经洞的性质和相关问题，确认该窟原是纪念高僧的影窟，性质与一般礼拜窟有别。《敦煌莫高窟》和《敦煌石窟》，前者是电视片的文字脚本，后者是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个条目，对敦煌石窟和莫高窟做了简要介绍。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是窟前发掘的出土物，是迄今为止北魏时期唯一一件遍地锁针绣品。《新发现的北魏刺绣》一文是对该绣品残存内容与年代的讨论。《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对该窟引人注目的佛教感应故事画和榜题文字做了新的辨识与解说，并第一次释读出东壁的戒律画。《敦煌莫高窟北朝本生因缘故事画》是在台湾历史博物馆讲演的文字稿，对莫高窟北朝本生因缘故事画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做了扼要的说明与介绍。《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是为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而撰写的，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做了概要式的回顾，并对某些滞后的基础研究工作提出应予加强的呼吁。

《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和《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三文，是笔者对敦煌县博物馆所藏一件极为重要写本的研究。正面是地志，背面是天文星图和占云气书。上述三文对该写本的各项内容分别进行了详尽的考述，还就地志中涉及的公廨本钱问题做了专题研讨。《父母恩重经》是儒家孝道观念色彩最为浓郁的一部伪经，《〈父母恩重经〉写本与变相》一文，是对该经现存写本与相关变相图的综合叙述。敦煌星图是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写本天文星图。英国李约瑟博士断定它“是一切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推断是公元940年的写本。笔者从写本的诸种内容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判定，该写本不晚于8世纪初。《〈敦煌星图〉的年代》是作者的具体论证。四兽因缘的故事，见于敦煌写本，而与汉文经典所记内容有别。该故事现今依然流传于藏传佛教中。《〈四兽因缘〉考》是对该写本与相关图像的论述，并推测敦煌写本源于藏传佛典。这一推测被巫新华后来的研究所证明（参见巫新华《论“四兽图”和“四兽因缘”故事的来源及流传》，刊《原学》第五辑，1996年7月）。

第四组七篇，没有集中的主题。

《龙门皇甫公窟》一文，根据考古测绘与调查资料，对该窟现存遗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和说明。《隋唐佛教寺院与石窟》系《隋唐文化》中的一章，对隋唐佛教石窟做了简要介绍。《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是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撰写的两个词条。《珍宝再现 舍利重辉》一文，是参观法门寺出土文物展后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明代天地会资料的新发现》，则介绍了张掖马蹄寺石窟中明代当地天地会会众妆銮佛像的发愿文，对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中韩古代佛教文化交流两例》一文，以泗洲大圣僧伽信仰和《父母恩重经》东传朝鲜半岛为例，揭示古代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历史的片段。

北京大学与中国佛教考古

——代前言

佛教考古学是宗教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社会科学。它通过佛教遗迹、遗物的表象特征，探求其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并对这些历史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揭示出某种信息的演进规律和历史内涵，从而达到重建或恢复历史面貌的目的。

中国佛教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佛教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物化资料，其特征和内涵，与佛教在中国发展、蔓延的状况和历程息息相关。对中国来说，佛教是来自异域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撞击和抗争。经过磨合与适应，佛教逐渐演化成能够适合中国信徒信仰要求，并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两汉之际。此后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始在下层民众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存在多条不同的路径，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陆路通道，仍然是经由西域到达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标榜出世的中国僧人们，充分意识到“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道理。而众多的帝王也注意到佛教有“敷导民俗”的社会功能，从而对佛教采取倡导或宽容的政策。除了历史上发生的四次大的灭法毁佛事件外，其他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故而，中国魏晋以降的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遗迹十分丰富，因此在中国历史考古学中，佛教考古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支学科。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佛教考古学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与中国佛教考古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开始调查佛教石窟遗迹，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

一

1922 年 1 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内设考古学研究室等四个部室。是月，研究所国学门为保存江苏吴县甬直乡保圣寺相传唐代杨惠之所塑罗汉像，特函江苏省教育会、上海美术学校，会同甬直乡教育会雇工将罗汉像连座取下，配制玻璃框安放在僧房别院。1923 年 5 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调查机构——古迹古物调查会（翌年 5 月改为考古学会）。该会宗旨为：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1924 年 2 月，研究所国学门发表《致山西、河南省长公函》，要求对天龙山、云冈、龙门、巩县等石窟妥加保护，严禁毁坏盗卖。同年 3 月，古迹古物调查会派顾颉刚、容庚、李煜瀛、褚保衡前往西山陆谟克学院，调查大觉寺、大宫山古迹及碧云寺等。1925 年 2 月，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受考古学会派遣参加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率领的敦煌考古队，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庆阳南石窟寺等甘肃佛教石窟做了调查。他在后来发表的《西行日记》中，记录了有关石窟中的题记和碑文等资料。此外，陈先生推测：庆阳有南石窟寺之名，应有与之对应的北石窟寺存在。庆阳北石窟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中被再度发现。1927—1930 年期间，北京大学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工作。他在新疆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时，也注意到了寺院遗址和石窟。在他后来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记录了焉耆锡科沁明屋（亦称七格星千佛洞）、库车库木吐喇千佛洞、克内什佛洞（即森木赛姆石窟）、拜城克孜尔明屋（即克孜尔石窟）、叶城奇盘庄佛洞等。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对吐鲁番附近的佛教石窟和寺院遗址亦有若干记录，如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等。黄文弼先生对新疆地区若干佛教洞窟做了编号，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并清理了部分洞窟，获得了一批佛教文物。

1942—1944 年期间，向达先生参加了西北史地考查团历史组工作，并

任组长。他在甘肃河西和敦煌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期间，曾长住莫高窟，对莫高窟和榆林窟做了考察和记录，所撰《瓜沙谈往》系列，即《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等论文，对敦煌史地、敦煌文书、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历史及佛教艺术，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1942年，向达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建立学术机构，以加强对莫高窟的管理和研究。后来在有关方面的促成和筹划下，在敦煌莫高窟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使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

北京大学历史系为学生开设《石窟寺艺术》专题课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阎文儒教授。宿白教授将考古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佛教石窟寺的研究，并在历史系和考古学系讲授《石窟寺考古》。两位先生均对中国重要石窟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阎文儒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初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组工作，和向达先生、夏鼐先生在甘肃河西、敦煌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期间，曾对敦煌地区佛教石窟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曾被聘为该所兼职研究员。20世纪40、50年代，阎先生曾先后调查了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益都（今青州）驼山和云门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等。1960年，锡兰（今斯里兰卡）有关部门邀请中国佛教协会联合编写《佛教百科全书》，阎文儒先生应中国佛教协会之邀，负责撰写《佛教百科全书》中的中国佛教石窟部分，为此阎先生专门主持一个佛教石窟调查小组，先后对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的重要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做了文字记录和照相记录。后来他根据调查资料，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石窟寺艺术总论》一书，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概述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渊源、流变以及研究中国石窟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第二章叙述了佛教石窟在全国的分布以及各地石窟的开创年代和遗存状况；第三章论述了自汉至南北朝石窟造像的概况；第四章阐述了隋代和唐

初的石窟艺术；第五章所论为盛唐的石窟艺术；第六章所论为中晚唐的石窟艺术；第七章研讨了五代、宋的石窟艺术。此外，他还撰写了有关龟兹石窟、吐鲁番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驼山与云门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的调查简报或研究论文。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招收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宿白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阶段的历史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而这一阶段的中国考古学，涉及许多专门考古学，如宗教考古学、建筑考古学、陶瓷考古学、中外交流考古学等。宿白教授在这些学术领域中，曾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在科学研究上亦均有建树。在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果尤为丰硕。

佛教寺院遗址和佛教石窟遗迹，因遗存宏丰而成为中国佛教考古的主要研究对象。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宿白先生在调查佛教寺院和佛教石窟时，即开始运用考古学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佛教寺院的整体布局和佛教石窟不同功能的洞窟之组合关系，最能体现寺院或石窟的宗教信仰需求和建筑本身宗教上的功能。佛教建筑物或佛教洞窟的具体形制，内中所容纳的宗教题材内容以及其设置和布局状况，总是强烈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它们是调查和研究佛教遗迹时应予特别重视的。佛教建筑物或佛教洞窟的附属设施或其遗迹，不同时期的改建、重修状况，对于恢复或认识其历史面貌以及不同时期演变发展的规律，亦可提供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类型学和层位学方法的使用，在确定诸多同类型的佛教建筑物或佛教洞窟的时代发展序列方面，有其特别重要的价值。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对于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或促进或阻碍的制约作用。宗教发展的中心区域，大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相一致。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关系中，总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沿袭的渊源关系。透过佛教寺院建筑物或佛教石窟中佛教遗迹的物化表象特征，揭示其宗教内涵，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并恢复、复原其发展历史的面貌，是研究这些佛教遗迹的目的之一。丰富的历史文献和佛教文献资料，在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凡此种种，在我们进行佛教考古的调查或研究时，是应该充分予以注意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宿白先生对中国佛教石窟的调查、研究以及教学实习之中。1950 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勘查团，

调查云冈石窟和山西北部古建筑。1951年他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派，与赵正之等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勘查。1957年宿白教授率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调查、实测南北响堂山石窟，并发现小响堂石窟。这次教学实习的具体组织和实施都是宿白先生独自策划的，当时考古教研室的刘慧达先生参加了辅导工作。在做考古学的全面记录工作中，宿白教授对测绘、照相、墨拓、数据登记、文字记录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实习中完整贯彻了宿先生关于石窟寺考古学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这次实习中所获取的全部资料，来不及正式整理和刊布，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散失了。但这次正规的石窟寺考古实习，为后来的若干佛教考古实习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62年秋季，宿白教授率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四人，赴敦煌莫高窟进行佛教考古的教学实习工作。同学们对第268～275窟一组三个早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记录，并分别为毕业论文收集相关资料。在此期间，宿白教授应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之约请，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业务人员，就佛教考古的有关问题，分七个题目做了连续的专题讲座。研究所将讲演记录稿整理成文，油印成《敦煌七讲》，供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内部参考。宿白教授在讲座中，对佛教考古研究的方法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对佛教石窟考古报告和洞窟分期排年两项佛教石窟的基础性工作，其在佛教石窟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具体的工作步骤和方法等，做了具体而详细的讲解和说明。他指出：佛教石窟报告的调查和编写工作，是佛教石窟研究和保护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通过测绘图、文字记录、照相、临摹等多种手段，将洞窟的现状和内涵做科学、全面的记录，经过整理研究，写出考古报告。报告将为研究该洞窟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料，同时也将形成该洞窟的科学保护档案。而佛教洞窟的分期排年工作，是要解决一组或数组洞窟之间的年代序列问题。确定其开凿次第，探寻其演化、发展的规律，总结其时代特征。类型学的类型排比，层位学之重叠、打破关系，在洞窟的分期排年研究中，不仅完全适用，并有其特殊的价值。宿白教授对于佛教考古方法的阐述和概括，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当时重新组建的考古组业务研究工作的基石。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所进行的几项考古研究工作，如崖面洞窟建筑遗迹的测绘与记录工作、北朝洞窟的分期、隋代洞窟的分期、唐代前期洞窟的分期、西夏洞窟的分期以及窟前建筑

遗址的发掘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与出版等，均是遵循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的科研课题，并取得重要成果。宿白教授在《敦煌七讲》中还特别强调了历史文献在历史考古学中的重要性。佛教石窟的产生与发展皆与彼时之历史条件紧密相联，不了解历史就无法解释石窟的宗教内涵及其产生的原因。宿白教授结合敦煌实际，以“敦煌两千年”为题，对敦煌发展的历史状况做了阐述与说明。后来他曾将此讲的前三个子题目增补，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为题公开发表。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涉及佛教石窟研究的诸多方面，如针对北朝洞窟的性质，指出北朝佛教石窟与禅观的密切关系，引用当时尚未发表的刘慧达先生的《北朝石窟与禅》一文观点，论证并阐述了北朝石窟之开凿和僧人习禅的宗教活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一精辟的见解和观点，对后来讨论北朝石窟性质的文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宿白教授的《敦煌七讲》虽未公开发表，但敦煌文物研究所油印的讲座记录稿，在研究佛教石窟的学界中仍有流传，不少青年学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宿白教授对佛教石窟基础研究工作以及方法的全面阐释，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并对后来中国佛教考古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诸如邯郸响堂山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等部分洞窟的考古报告的编写和洞窟的全面测绘与记录工作的展开以及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分期、克孜尔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的分期、龙门石窟的分期、炳灵寺石窟 169 窟的分期、须弥山石窟的分期、天龙山石窟的分期、义县万佛堂石窟的分期等，均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北京大学的佛教考古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教学上，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首批佛教考古研究生三人于 1978 年 9 月入学，并在宿白教授率领下于第二年奔赴新疆，与克孜尔石窟文物保管所合作，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大量测绘和记录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资料。其主要成果刊布在《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和《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中。后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又招收了多届佛教考古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其中，受国家文物局委托，1985年考古学系还专门招收了一届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共五人。1994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佛教考古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课程设置上，本科生已从原来的石窟寺艺术专题课扩展到现在的中国佛教考古和印度与中亚佛教考古两门限选课，佛教考古研究生的必修课则有中国佛教考古专题、中国石窟寺考古、印度石窟寺考古、国外佛教考古专题和汉文佛籍目录等。此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还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了两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各用人单位的好评。在科研方面，宿白先生作为中日合作出版的十七卷本《中国石窟》的中方两名主要编委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为此做了精心的策划和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套丛书中，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先后主持编写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八卷，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普遍赞赏。其中，三卷本《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于1986年荣获首届“夏鼐考古研究成果奖”一等奖。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云冈举办第一届石窟考古专修班所用的讲义，后经修订于1993年出版，题为《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成为国家文物局教育处指定的石窟考古教材。此外，马世长教授主持编写的《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也是研究这处石窟的必备参考书。至于文物出版社1996年结集出版的宿白先生的两部论文集——《中国石窟寺研究》和《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则是中国佛教考古的杰作，必将永为世法。前者于1997年荣获美国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颁发的第三届“岛田著作奖”。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集的论文计二十三篇，可分为六组。首篇《中国石窟寺考古》是对中国石窟寺的概括论述。第一组两篇，探讨了克孜尔石窟和凉州石窟两处中国石窟最早的遗迹的年代和特征。第二组五篇，是关于云冈石窟分期、历史的论文。第三组两篇，所论包括洛阳地区北朝石窟和江浙地区两处南朝石窟。第四组九篇，主要研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的部分洞窟。第五组两篇，论述了拉萨和杭州的藏传佛教龕像。第六组附录文章两篇，一篇是已故刘慧达女士探讨北朝石窟与禅观的论文，另一篇是宿白先生对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变化的探讨。总之，本书既是宿白先生50年（1947—1996）来从事中国石窟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如何进行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一个真实写照。该书资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极见功力。先生对中国石窟严谨的区系研究与编年体系，充分确立了历史考古